

胡文生 著

向西方学习 走近胡适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人的个性。
与社会抗争，唤醒国民，成了胡适一生的使命。



人文精神系列读本

总主编 吴光远

胡文生 著

向西方学习

走近胡适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人的个性。
与社会抗争，唤醒国民，成了胡适一生的使命。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西方学习——走近胡适 / 胡文生著 .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1

ISBN 7 - 5087 - 0248 - 4

I. 向 ... II. 胡 ... III. 胡适(1891 ~ 1962) — 人物研究
IV. 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9946 号

向西方学习——走近胡适

著 者 胡文生
责任编辑 秦滟 向飞
特约编辑 李阳泉 杨学会
装帧设计 王洪文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2
电 话 (010)66020531(策划部)
 (010)66021698(发行部)
 (010)66060275(邮购部)
传 真 (010)66026806 66051713
电子邮件 xiangfei@ wanglaochu. com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9. 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87 - 0248 - 4/K · 73
定 价 20. 00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人文精神系列读本》

编委会名单

总主编：吴光远

副主编：胡文生 刘永谋 闫玉刚

编 委：吴光远 胡文生 刘永谋 闫玉刚
王兴彬 李 勇 刘丽敏 田宝锋
陆云达 徐加胜 韩孝成 王 峰
钟文伟 刘青新 郭春孚

总序：中国呼唤人文精神

两千年来，中国传统道德一直把国民当“奴才”来驯化，而以发展科技为特征的现代文明又把人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物”。

中国人从未成为过真正意义上的“人”！

没有“人”的觉醒，中国绝不可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全球化。

让我们来回顾历史。

150 多年前，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

对于现代化，最初，人们很自然把目光盯在物质的层面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或称“自强运动”。以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僚为代表发起了 19 世纪 60~90 年代的自强运动，其最主要成就是建立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北洋水师。1894 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宣告彻底失败。

看来，光有物质上的现代化还不行，于是人们试图从体制层面上进行改革，这便有了“戊戌变法”。1898 年，以青年知识分子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推动光绪皇帝搞体制改良，颁布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变法新举措，结果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强烈阻挠。变法只维持了 103 天(故又名“百日维新”)，便因慈禧的宫廷政变而宣告失败，光绪被软禁，康、严、梁等逃亡国外，谭嗣同、杨光弟等被害。

物质的以及体制的现代化尝试，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人

们把目光又转向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企图用革命来推翻落后的封建制度，于是又有了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发动了武昌起义，以武力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帝制虽被推翻，但孙中山先生所设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却并没有建立起来。很快，袁世凯复辟，引起各地军阀混战。故而孙中山先生临终不无遗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封建社会内部的洋务和变法运动，以及推翻封建社会的革命等一系列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措施，为什么都没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说，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走不通？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去西方看看，他们是怎么走上资本主义或现代化道路的。

在西方，与中国辛亥革命相类似的，是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两者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不同的是，法国大革命后，成功地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而中国则没有。这是为什么？

其实，西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

欧洲封建社会的结束，是以 1453 年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为标志。但封建社会结束，并不等于就是资本主义建立了。欧洲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 1581 年尼德兰革命后的“荷兰共和国”，这中间也经过了 100 多年。到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则是经过了 300 多年的时间。

在这 300 多年的过渡时期里，欧洲世界“不知流了多少血，闹了多少事”（陈独秀语）。先是从 14 世纪开始至 16 世纪结束的文艺复兴运动，然后是近代科学革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近代工业革命、18 世纪法国思想启蒙运动等。这一系列的运动和革命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做了大量的、坚实的思想上、物质上的准备。

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促使了西方社会人对自身的发现和解放，即把人由上帝的奴隶变为自己的主人。正如但丁所言：“人

的高贵，要超过天使。”“人文”、“人文主义”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所谓“人文”，意即“属于人的”，因此，文艺复兴运动也被称为“人文主义运动”。

18世纪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它要求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来保障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价值，于是“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资本主义精神，在欧洲深入人心。这样，推翻帝制后，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中国，两千年的奴化教育，使中国国民成了封建特权者的奴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皇帝虽然退位了，而人们头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袁世凯的复辟也就成为必然。因此，在当时情况下，资本主义对于中国来讲是太先进，所以走不通。

看来，要在有两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家，首先必须唤醒民众，把中国人从奴隶意识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认识到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所以，孙中山言“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单换一块共和国的招牌，绝不得谓革命成功”。

于是，中国有了自己的文艺复兴运动或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场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发端，其目的就是进行思想启蒙，唤醒民众，传播资产阶级文化。该刊的副标题用法文“La Jeunesse(青年)”，用意就在表明陈独秀对法兰西文明的仰慕。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鲁迅以小说和杂文的形式，对国民性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和鞭笞，其用意是要揭露中国“吃人”的旧道德，从而挽救“中国国民性的堕落”，召唤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主性，铸起“民族的脊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代替了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被迫中断。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前后总共才持续了20多年的时间，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确立，则经历了

三四百年的时间。显然，对于深受两千多年封建传统影响的中国国民来讲，20多年的人文思想启蒙，是完全不够的。

当然陈独秀、鲁迅等人所理解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以“民主”、“科学”为理念的近代化，民主与科学正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文明的两大成果。到了今天，特别是经过“二战”，理性主义已经过了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现代西方主流思潮普遍认为，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正在把人类以及人类文化带向一个陌生、冷漠、黑暗、充满危机的世界。

首先，科技的发展导致人性的异化、人情的冷漠。

人类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日以继夜地发明技术，但大工业使人变成机械的一颗螺丝钉，人性丧失了。各民族为了谋求征服自然和其他民族的强大力量而组织在一个技术工业的政治组织中，但冷酷无情的官僚政体使个人变成一个号码、一张证书，个人变得软弱无力了。

而人性是多方面的，它不仅需要有理性，更需要的是情感，是温暖，而科技、理性主义则剥夺了人的这一需要。相反，人成了机器的奴隶，成了规律的宿命。人在强大的科技面前感觉到束手无策，只有恐惧和战栗。

其次，越来越细致的学科分类和专业分工，正在使人类日益退化。

据说，有一个曾在宫廷御膳房供职的厨师，后来受雇于某大户人家。主人想以其资历炫耀一番，命他烧制一桌宫廷宴席宴客，答曰不能，因他是专做宫廷点心的。又令其制作一席宫廷点心待客，又答曰不能，因为他是为做某种点心专职切制葱末的。

今天，从事各种专业工作中就有不少“专门切葱”的。人们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知识也越来越窄。人们虽然在某一领域是专家，但在其他领域则可能是“白痴”。人的综合素质已经大大降低，人成了某一领域的“工具”，而不再是完整的“人”。

再其次，科技应用于战争，人类危在旦夕。

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首先不是用来为人类改善生活，更多的是用于消灭人类的战争。比如，计算机的出现，原子弹的出现等等就是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科技与战争的结合，对于人类的未来将是毁灭性的。二战中，投在日本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使数十万人丧生；二战后，超级大国的核竞赛，使我们的地球面临着随时被毁灭的威胁。人类处于灭绝的边缘。

最后，“全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即人类面临的四大困境或四大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生态危机。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正在越来越多地消耗地球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全球问题，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科学因为人文主义的兴起获得了今天的高度繁荣，但是反过来，现代科技的发展又日益束缚人性，人文精神日益丧失。因此，理性主义文明已日薄西山，代之而起的是“非理性主义”，也叫做“人文主义”。

现代人文主义完全不同于近代人文主义，近代人文主义是以唤醒人的理性为目标，而现代人文主义则是以呼唤人文精神为目标。所谓人文精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其基本内核就是要求关注“人”的存在，关注“人”的情感、“人”的权利。这既包括对作为整体人类的生存状况、前途命运的思索，但更多的是对作为个体“人”的尊严与独立的关注，它包括对人的天赋权利的捍卫，以及对愚昧、强权等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排斥。

有人把近代人文主义运动称为“第一次启蒙”，而把现代人文主义运动称为“第二次启蒙”。在全球化人文主义思潮和中国追赶现代化浪潮的双重背景之下，一场人文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已经呼之欲出。我们深信，中国虽然没有赶上“第一次启蒙”，但赶上“第二次启蒙”正是时候。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身边已经有不少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年轻知识分子正在从事这场艰难而细致的启蒙工作，他们堪称我们

这个时代的“新青年”，青春的身体跳动着激情的脉搏，年轻的头颅满载着新鲜与深邃。他们的青春以复数的形式存在，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史。现代“新青年”们高举“人文精神”大旗，犹如当初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一样，将引领我们的国民关注人文，关注人的存在、情感、尊严、权利与未来。

我们的《人文精神系列读本》是并不难懂的青春史诗，愿我们的努力能为中国点燃思想启蒙的星星之火。

是为序。

吴立波

2004 夏 于北京颐清园

前　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人文主义运动，它所提出的命题——如民主、科学、伦理觉悟等都是具有新时代意义的人文精神。

追忆新文化运动，胡适当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胡适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坐标，不同派别的人都可以在对于胡适的批判和赞同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他是全盘西化论者，是传统文化的颠覆者；对于国民党来说，他是一枚可以利用的棋子；对于共产党来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堡垒，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而对于殷海光等后期自由主义者来说，他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是一只时代的鸵鸟……

胡适是一个悲剧，他的悲剧在于他对旧时代的反抗只限于思想而无法付诸行动。他为了妇女的解放那么不遗余力，他对于旧式的婚姻那么痛恨，可是他却容忍了自己的小脚太太，一辈子不离不弃。他热情地歌颂“娜拉的出走”，可是他无法追求自己的爱情，他是爱情的懦夫，让爱他的人受到深深的伤害。在家庭方面，胡适也是一位旧式家庭的诅咒者。他对于传统家庭的罪恶深恶痛绝，可是终其一生，胡适都遵守着母亲的教导，胡适的生活中，有着太多她母亲的影子，这是我们今天在胡适这位新文化人物身上所发现的不可思议的事实。胡适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是新文化人物中一道十分独特的风景线。在文化方面，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却又以新文化盟主的身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整理国故

运动。让一般激进与保守的人物都摸不着他心思。他身上充满了太多的荒谬，在他死后，蒋介石送了他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

当然，胡适在近代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作为国人导师的胡适。胡适一生以方法论大师自居，他甚至宣称他所有的工作只是要教导人们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的确，中国人是缺乏科学思维的头脑的。传统的中国人的思维大都是笼统武断的，长于直觉思维，而不善于逻辑思辨。中国人思维的启蒙始于严复，而成于胡适，这是胡适一项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正是由于胡适对于科学方法的提倡，使得中国人经历了一次系统的近代思维方式的训练，使得科学融入中国人心灵的进程大大加快。胡适的科学方法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就是被作为胡适“十字箴言”的科学方法。它简洁明了，却含义深刻。它是美国实验主义与乾嘉考据学的天然结合所诞生的产物。

胡适的科学方法是与个体解放紧密相连的。科学方法不仅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因为胡适提倡科学方法是要人们学会如何独立思考，而不做暴君和迷信的牺牲品。一个具有求证精神的人是不会轻易被政客的几句谎言所迷惑的。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用空洞的口号迷惑人，这是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真正思想内涵。因为“主义”诚然美好，但也可能被无聊的政客利用作愚民的空头支票。所以胡适毫不隐讳地宣称，他是实验主义的信徒。

在胡适身上，还有一个光环——那就是自由主义的大师。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他是自由主义的真正提倡者和实践者，虽然他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在近代的政党角力中，胡适的自由主义信念显得那么单薄，那么无助，可是胡适的可贵在于，他面对强权的威胁与利诱敢于声明他的自由主义的立场，虽然实际的效果不大，但其象征意义仍然是十分可贵的。他的人格的力量足可以在政党政治的笼罩中发出一片灿烂的光芒。因为无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处境多么尴尬，但自由始终是人类梦寐以求

的一种生存状态，永远值得人们去追求。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的使者，他播撒的人文主义的种子必将茁壮成长。当然，胡适不是一尊偶像，更不是一尊让人崇拜的神。一个理性主义者是绝不会让人去崇拜自己的，但他可以是我们的一位良师，一位益友，他的理性或许能点拨我们的迷茫，他的人格或许能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那么，让我们去亲近一下这位“朋友”，去了解一下他的所思所想，又何乐而不为呢？

胡文生

2004年7月1日

3

前
言

目 录

总 序：中国呼唤人文精神.....	1
前 言.....	1

第一编 重估旧文明

第一章 文化批判：直面祖宗的“罪孽”

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这辉煌的遗产既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沉重的负担。如何清理这笔遗产？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眼光的高低无疑影响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判断。

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勇士们扛起整理国故的大旗，对传统文明作出一番清理，为我们清开一条大道，这个功绩是不应当被忘记的。不仅如此，胡适对于传统的理智态度，对于中国文明的信心代表了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水平。

一、认清祖宗的“罪孽”.....	3
------------------	---

我们的祖宗有哪些“罪孽”？	3
“信心来源于真诚的反省”	5
二、思想领域的除魅：“整理国故”	9
“故纸堆”中捉鬼	9
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	13
整理国故的基本方法	15
三、“全盘西化”的是与非	19
被误解的“全盘西化论”者	19
戳破“折中调和”的迷梦	23
“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	26

第二章 伦理觉悟：摧毁扼杀人性的旧道德

胡适对于传统的陋习是深恶痛绝的，小脚、鸦片、八股、妾……太多的丑陋，他曾经激进地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一切都需打倒重来，我们要再造我们的文明。

再造文明，首先必须重新厘定我们的旧道德。一切“三纲五常”的教条都必须打倒，一切伪善的不人道的观念都必须抛弃，一切愚忠、礼教都必须在人性的基础上加以重建。

一、打倒孔家店	29
查查“孔家店”的老账	29
“打倒孔家店！”	32
二、被错估的人性	35
“性善”还是“性恶”？	35
在人性的基础上重建中国人的道德	38

三、礼教！吃人的礼教！	41
“君为臣纲”是造就奴才的根源	41
“孝”不应牺牲子女的人格	43
为妇女解放鼓与呼	45

第三章 国民性批判：医治民族心灵的创伤

鲁迅对于还在蒙昧中的国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者用愚民的政策把民众变成了麻木、自私、愚昧的庸众。统治者为一己之私而阉割了国民健全的人格和思想，从而造成中国国民性的灾难。

必须要把民众从专制的噩梦中唤醒，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的生活。而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正是惊醒国民噩梦的阵阵惊雷。

一、要“名分”：中国人的“名教崇拜”	48
“名教”：中国人惟一的宗教	48
被“名教”奴役的国人	51
“名教崇拜”与阿Q精神	54
二、“差不多先生”：麻木的国民自画像	56
给“差不多先生”把脉	56
“中庸之道”：“差不多先生”的病根	59

第二编 呼唤个性解放

第四章 个性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前提

中国人的人性被压抑得太久，那“三纲五常”的旧伦理就像

一头残暴的怪兽，任意摧残着人的尊严，扼杀着人性中一切美好的东西。而这其中受害最大的就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处于旧伦理秩序的最底层。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个性解放是继民主与科学之外的又一个时代主题，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妇女和儿童的解放。我们都应该知道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而胡适对于妇女和孩子的解放也倾注了满腔热情。为此，他对传统的纲常伦理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勇敢地与一切顽固的旧伦理拥护者做斗争。

一、人是万物的尺度	67
中国的“文艺复兴”	67
“一切为了人的解放”	70
二、从贞节牌坊中救出妇女	73
不尊重妇女的文明是野蛮的文明	73
“贞操”问题大讨论	75
“打破处女迷信”	77
娜拉的出走与女性人格的独立	80
三、从家庭伦理中救出孩子	82
重要的是要使孩子成为“人”	82
孩子不是父母养老的存款	87

第五章 “健全的个人主义”：新社会的伦理之基

面对腐败糜烂的社会，个人应当怎么做？

胡适坚定地回答：最要紧地还是救出你自己！他呼吁人们不要与旧社会一起沉沦。胡适以“健全的个人主义”作为对抗社会扼杀个性的利器。